

天全文史资料

第二期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天全县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三月

目 录

封面题字	杨 超
红岩坝乡亲心目中的“红大”	尹敬勋 (1)
老场乡白土坎红军烈士纪念地	裴大元 (3)
解放前夕民盟天全组织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活动片断	高明星 (4)
保路风潮拾遗	江汉平 (6)
天全茶叶史初探之一	退休教师 杨仁飞 (9)
我县猕猴桃资源调查	杨志全 (11)
天全县西医药进入经过	彭苏苍 (13)
天全县国大代表选举经过	杨国治 (14)
忆解放前夕我响应起义的一些情况	李家甫 (15)
解放前夕的李元亨	政协文史组整理 (17)
地方风物志	
燕子岩	政协文史组 (18)
牛魔王洞	政协文史组 (19)
摇亭碑记	李家甫 (20)

红岩坝乡亲心目中的“红大”

尹敬勋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初，一支红军部队驻进了天全县老场乡的红岩坝。除了纪律严明，生活艰苦，爱护群众这些红军的优秀品质外，他们的严格训练，刻苦学习，在红岩坝乡亲的心目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支部队就是随红四方面军南下天全的“红大”——中国工农红军大学。

“红大”是在伟大的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夹金山会师后，在《八一宣言》指导下，为保存和培训大批军、政干部，提高各级干部的军事、政治水平，以适应抗日救国战争的需要，继承闽西“彭杨学校”和瑞金“红校”的传统，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底在草地松岗红四方面军总部所在地（位于今金川县以北）成立的。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担任校长。“红大”成立后两三天，就沿大金川西岸南下，进驻金川县以北的沙尔尼村，在那里集结了学员，建立了校领导机构。两星期后奉命随军沿大金川西岸经丹巴县东渡大金山，翻越夹金山（大雪山）南下。经宝兴、芦山到达天全县红岩坝。在这里，“红大”还进一步扩大，把由部队调来的班、排、连干部组成了附属步兵学校，有步、骑、炮、工、辎等多兵种。刘伯承同志兼任步校校长。一九三六年初“红大”奉命撤出红岩坝，继续北上。

三两个月的时间是短促的，但是就在这短暂的一段时间里，“红大”不仅完成了第一期教育计划的三分之二，而且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红岩坝乡亲的心目中留下了永远不能磨灭的光辉形象，在乡亲们的心田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红大”到红岩坝的时候，连工作人员带学员一共有千余人，还有几百匹坐骑。住房、课堂和马圈都要靠当地腾房借屋来解决。由于几个月以前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在天全过境时，给红岩坝乡亲们留下了纪律严明、爱护百姓的良好印象，他们热情地接待了“红大”，人马很快就安顿下来了。在杨明远家和隔壁的下祠堂设置了政治部，在杨绍其家住下了医院，马圈也在杨中良家布置妥当。运输连、机炮连、工兵连……也都找到了住处。杨克璧、杨定芝和杨克鑫等人都热情地腾出房间接待了学员。为了不过分增加群众负担，“红大”的同志们都在连牵地铺上挤着睡觉。杨培基家还帮“红大”安排了粮食仓库。

人马一住定，“红大”就开始了紧张的教学活动。

天蒙蒙亮，学员们就分别集合到沙坝头和河坝出操。沙坝头，有的在打靶，有的手持木棒在练刺杀，有的用木制手榴弹练习投掷……；河坝里，有的在骑马跑操，有的在翻杠架。到处生机勃勃、龙腾虎跃。工兵们不顾天寒水冷沿河上下练习架设提篼于桥，既学会了架桥本领，也还给群众往来过河提供了方便。围观的乡亲们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到了下午，学员们分五、六处听教员讲课。乡亲们看到各处的教员一面在黑板上写写画画，一面耐心细致地讲解。他们还看到在杨克勤家的那个“课堂”里堆着沙盘，教员和学员

比划地讨论。还有时，学员们砍回一些可当柴烧的桦橙树，在沙坝头插成道路、房屋、城镇的样子，练习进攻。

休息的时候，有些学员围在墙报《战火》前面，边看边议论着；有的拿着笔墨在各处壁头上书写红军标语。有些文化较低的学员还找知文识字的房主人帮忙在笔记本上记下听课的内容。有些学员和才结识的乡亲们摆谈革命道理、拉家常。

要在小小的红岩坝解决千把人的吃喝，那可是个大问题。因此运输连每天都要派人赶上牲口外出运粮，一天一转，很少间断。乡亲们也帮“红大”磨豆腐、烧开水。乡亲们割菜卖给供给科，都按价得到了银元、铜钱、布币。为了补充服装，供给科还请了杨朝勋等人为红军缝制了两个多月的军服；在一座磨房里几位棕匠在忙乎着为“红大”加工棕衣。

“红大”和群众和睦相处，鱼水情深。

夜幕降临了，乡亲们围坐在一起哼唱着由两位女红军教唱的红军歌曲，至今都还有人能唱出“红军打白军，穷人要翻身。白军走，红军来，穷人要发财。”每隔几天，“红大”还要办一次晚会，乡亲们总是被安排在前头中间坐下，干部学员就围在侧边和后面。乡亲们至今还记得有一次晚会节目当中那个反动派火烧民房的逼真场面。“红大”刚到红岩坝，就曾开了一次纪念十月革命的大会，还演了戏。春节的时候，“红大”还专门办了五、六桌宴席招待乡亲们吃了一餐军民团年饭。

但是，为了北上抗日，红军又继续进行长征。春节后不久，“红大”就奉命撤离红岩坝，随军继续北上了。临行前两天，他们就清还了向乡亲们借用的家俱。把驻地打扫干净之后，在乡亲们依依不舍的送行中，“红大”的同志们又循着南下的原路，踏上了征程，其中也有不少当地青年和“红大”的同志们并肩投入了北上抗日的洪流。

(根据红岩坝群众口碑材料整理)

老场乡白土坎红军烈士纪念地

襄 大 元

一九三五十月，红四方面军南下解放天全后，在老场乡白土坎胡二莲家设立了一所红军医院，院长为周光坦，政治委员张琴秋，政治部主任傅连暲，主要是收治在大岗山、老君山、朱沙溪等地战斗负伤的红军伤员。最初伤病员不过二、三十人，到了冬季，从飞仙关送来的伤员增多，有时达一百余人。医院有工作人员数十人，女同志占多数，还雇用了当地农民七、八人当勤杂工。医院工作人员除治疗伤病员外，还经常深入群众，宣传革命的道理和党的方针政策。

当时由于医疗条件差，药物器械缺乏，一部份伤员牺牲后，即用当地地主的棺木安葬，并雇请木工用木板做成“火匣子”式的简易棺木，陆续安葬在被恶霸地主杨名轩霸占的坟地上。在红军停留天全的三个月中，共埋葬烈士二百多名。

当地恶霸地主杨名轩早在红军到达泸定县的岚安时，即利用其团总身份，勾结国民党政权在天全的驻军，纠合一伙袍哥队伍，妄图对抗红军。国民党驻军溃逃时，杨名轩还派人为之带路，然后逃往芦山一带。一九三六年二月，红军撤离天全北上。杨名轩等回到老场后，强迫当过村苏维埃干部的群众多人，将已埋葬的红军遗体全部挖出，用棺葬的也将遗体拖出，将棺木洗净后运往芦山出售，然后集中红军遗体在白土坎木鱼岗上挖了两个大坑，堆集柴火，泼上清油后焚烧，烧了五、六天，再在骨灰坑上覆盖泥土，以后还迁了一座小庙立在骨灰坑上。

解放后小庙已毁，杨名轩已依法处决，骨灰坑遗迹尚依稀可辨。为了纪念革命先烈，县有关部门已计划在遗迹处修建烈士纪念碑亭，著名军内作家魏巍一九八三年来天全时，曾亲往白土坎悼念，并再次建议修建纪念碑亭。现修建方案已拟定，正上报审议中。

解放前夕民盟天全组织 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活动片断

高 明 墨

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解放之后，国民党政权在崩溃的前夕，蒋介石把残部集结于西南，对我成渝两地的地下党员、民主党派成员和进步人士实行疯狂的镇压与屠杀，妄图以此来延缓他们灭亡的命运。

回顾民盟天全组织，在地下党的领导之下，在民盟西康支部（省委员会）筹委会的领导下，一九四九年九月，在天全建立了民盟基层组织，由当时的天全中学教师蒋文全（又名蒋国基，党盟交叉，现任成都科分院副院长）负责。

民盟天全组织，为迎接解放，与地下党的同志黄仲实、陈为珍（化名董苑茹，党盟交叉），唐绍虞（化名贾先生）、高仕荣（党盟交叉，原始阳师范学校校长）等同志紧密联系，在地下党领导下，共同学习了民盟西康省支委会（筹委会）主办的《光明旬刊》。

《光明旬刊》系根据新华社的消息，主要宣传当时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它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八日发行了第一期。此后，每期有时事述评，有专论和解释群众疑虑的文章，还宣传了新政协的召开，报导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和《共同纲领》、《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

这个刊物由地下党杨正南同志（解放后任西康省教育厅厅长现任云南省计委主任，党组书记）和彭迪先同志（现任民盟省委员会顾问、民盟中央副主席）共同负责编辑。他们日夜辛劳，为维护革命秩序，安定地方，发动群众，支持配合刘文辉先生起义，作出了不少的贡献。

民盟天全基层组织，在城厢部份教师中，成立了民盟的外围组织“教师联谊会”，推选高曰洁同志为负责人，由我担任联络工作。同时，还筹组了《晨曦读书会》，组织青年朋友学习新知识，刻写学习资料，研究有关问题。这个读书会的成员，有杨克纯、王纪源、银世泉、邱水（以上四同志均系盟员）刘登驥（现任芦山教育局总支书记）、杨永寿同志（已故）。读书会的任务，就是在城里与青年交朋友，宣传党的政策，解释社会上一些受反动派宣传的群众的疑虑，用以安定人心。读书会由杨克纯负责，罗文清（地下党支部书记，现省文化厅处长）舒济质（现在西昌师专，民协成员）负责指导。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刘文辉通电宣布西康起义，西康军政人员也随之起义。在地下党的领导之下，成立了西康临时军政委员会，主要是安抚群众，维持秩序，发布解放军的各项命令，通令各县军政人员，坚守岗位，保护公共财产，作好准备，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民盟天全组织，为了进一步做好解放宣传工作，在天中校门和景葛楼地段，设立了黑板

报宣传栏，报导转载了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的胜利消息，并剪贴了党的领导人和解放军主要将领的画像，扩大了宣传效果。

盟组织还举办了“青年学习会”，学习了《新民主主义论》、《共同纲领》、《论联合政府》，并由陈为珍同志讲述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和教唱革命歌曲：

“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哪，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

舒济质同志还教了秧歌舞，青年们的学习气氛十分活跃。

西康起义后，解放大军尚未到达，胡宗南残部逃窜路过始阳，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长胡长青委任天全匪首李元亨为反共救国军的军长。这时，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民盟天全组织负责人蒋国基同志，为了安定人心，做好迎接解放的工作，希望民盟组织组成的《荣经流动剧团》来天全和始阳演出。经请示省民盟筹委会同意，全团同志在张文政团长的带领下，不辞辛劳，徒步来到天全和始阳两地，演出了《白毛女》歌舞剧和《蒋匪逃台》，伴以“你这个坏东西”的歌声，内容适合农村，深受群众欢迎。

演出的当天晚上，地方上的盟员同志，同话剧团的同志，举行了联欢会。由始阳师范学校校长高仕荣主持会议，共有四十多人参加。当时正值严冬季节，北风劲吹，寒气袭人，但我们的内心是沸腾的。发言的同志慷慨陈词，愤怒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盼望解放军早日到来。更值得回忆的是，重庆大学的曾紫霞同志（同盟交叉），她在《白毛女》剧中扮演喜儿，她刚从渣子洞脱险出来，她的爱人尚在特务魔爪之中。她发言时，声色俱厉，声泪俱下，这本来是盟员欢聚的集会，结果开成了一个控诉会。给我们地方上入盟不到半年的盟员同志，进行了一次很好的革命教育。联欢会在高呼“打倒蒋介石、建设新中国！”的口号声中结束。

一九五〇年二月八日，终于把解放军迎来了。那天下午，地下党的同志，民主党派的成员，同天中、天全简易师范两校的教师，以及青年学习会的男女青年、人民群众共三百余人，手持用红纸做的五星红旗，齐集在接官亭（现养路段），夹道欢迎解放军。

解放军在入城时，头戴钢盔，全副武装，排成整齐的队伍，前面打着一面大红旗，边走边唱着解放军进行曲。欢迎的人群一边鼓掌，一边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一边唱着刚学会的革命歌曲：“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跳着秧歌舞，大家跳得那么欢快，这的确反映了当时群众的心情，真的盼来了解放，天亮了。解放军入城的这一天，是天全人民最快乐的一天。因为新的生活将以这一天开始。人民群众一直把解放军迎到驻地。地下党的同志黄仲实、陈为珍等向中共天全县委汇报了工作。

中共天全县委刚入城，工作千头万绪，他们的时间，可以说是以分来计算的。然而县委书记王瑞（现任省计经委副主任）还是安排时间，接见了地下党员、民主党派的同志和进步人士，讲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并对大家在解放前夕所做的革命工作，给予鼓励和赞扬。从此，民盟天全组织的成员，在中共天全县委领导下，参加了党的各项政治中心工作。我们的青年盟员有银世泉、杨克纯、王纪源、高秉权（已故）在党的培养下，先后参加了共产党。

保路风潮拾遗

江汉平

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历史上最末一个封建专制王朝——清朝，进入了末日。这个时期，四川爆发了一场巨大风潮——保路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慷慨悲壮的一页。据今县内健在的一些老人介绍，民国时期，县内口碑载道，传保路风潮一起，天全县境内城厢、灵关、始阳等地均有民众起而响应，投身保路运动，有的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不可谓无功。遗憾的是这一爱国壮举，文献档案仅见只言片语，地方亦无载籍如实录存，当事者皆作古人。为了使这段可歌可泣的地方史实不至于流失湮没，今据部分史料及县内部分老人的座谈介绍，拾掇成篇，题为“拾遗”，以备知情者和有关同志参考，补充订正。

公元1911年（宣统三年），清廷从邮传部奏请取消商办铁路议，继续违背民意，一意孤行，坚持向英、法、德、美四国借款筑路，强将粤汉、川汉铁路收为国有，“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1911年5月9日，清帝谕旨，转引自《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严令“自降旨之日起，所有川湘两省租股，一律停止”（1911年5月22日清帝谕旨，转引同上），大发丧权辱国热。6月18日，以“破约保路”为奋斗目标之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逾四千。同志会成立旬余，开会“不止十次”，每次“不止数千人”，会众“激昂悲壮，热血喷涌”，并致函各府州厅县“速行组织分会”（转引《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宣称“同志会众惟先海内决死而已，不知其他”（《保路同志会宣言书》，转引《四川辛亥革命史料》），表明保路爱国的决心。

7月底，为镇压川人保路风潮，清帝旋令赵尔丰为川督，率部兼程赴川，“多派员弁实力镇压”同志会众（《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8月3日，川督赵尔丰到任。8月4日，同盟会员龙鸣剑、王天杰邀集各地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罗子舟、孙泽沛等于资州罗泉井秘密召开重要会议，商议起义方略，决定将同志会改称同志军，以武力反对清廷的武装镇压。9月7日，赵尔丰在督署逮捕蒲殿俊、罗纶等同志会首领，并令清军枪杀请愿群众（死伤数十），制造了成都血案。

血案发生后，同盟会员曹笃、龙鸣剑、朱定琛等连夜巧制“水电报”向各地同志会众通报“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旋即，全川各地相继举事，武装抗清，四川保路运动进入高潮。此前，雅属各县亦组织了同志会。会众保路爱国热情喷涌，即令斑白老叟，“亦甘愿尽力，之所至而不畏死也”（《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二十号，转引自《四川辛亥革命史料》）。据载，保路战端一开，雅安、荥经、名山、天全、灵关、穆坪等地均组织了同志军，并踊跃投入了战斗（《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四川保路运动大事月表》）。是时，天全诸地同志会众也如别县会众一样，并未置身“桃源”，而是“智识程度增进，非复昔日醉生梦死时也”（《四川保路同志会报

告》第三十二号，转引自《四川辛亥革命史料》，爱国热情也是很高的。

9月中旬，全川各地同志军纷纷行动，狠狠打击了清军势焰。清廷惶恐万端，频频调动部队，疯狂镇压保路民军——同志军。自雅（雅安）至炉（康定），“梗阻事急”，“人心惶乱。”时川滇边务大臣傅嵩龄应赵尔丰电催，遣兵驰援。雅州清军，自雅入炉的主要通道有荥经、清溪一线，和天全、泸定一线。傅部赴雅，主力走荥经，在大关山受阻于雅安罗子舟的一部民军和荥经李永忠的五大哨民军，计四十日左右“无一兵弁援省”（《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为了防止由泸定而东的清军驰援雅州，天全同志军的首领之一邱须乎（天全城厢人）率部在今天全城厢至泸定一线的险要关隘要口设防，阻击东行之清军。9月下旬（约在28日前），鱼通的同志军与穆坪同志军之一部，天全同志军之邱部乘泸定空虚，相继驱兵抵炉，联络蕃民及清军部分兵勇里应外合，并配合雅安南路趋炉之民军，势迫泸定。顿时，坐守泸定的钟寿康百般惊惧焦虑，接连急电坐镇巴塘的傅嵩龄，“又闻木坪，勾鱼通为乱，匪势趋炉，警愈迫。”“探叛匪三路趋炉，一股已到飞越岭。炉报紧，枪弹百万、银念余万，泸城若失……为患更烈。”“会匪已到炉桥……城内并有内应，内外交迫。焦悸！”（《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这样，雅安南路和西路的同志军趋炉，就牵制住傅嵩龄部清军，配合了同志军围攻雅安的斗争。傅嵩龄遣兵入川受阻于雅炉之间，进退维谷，于是便急迫向清驻藏大臣联豫发出咨文，请求驰援炉城，傅本人也亲自赴炉坐镇。嗣后，保路民军与傅嵩龄部在泸定一带展开了颇为激烈的争夺战。争战数日，终因傅集结了驻康巴地区的清军，人多势众，民军遂为清军攻破。据传，天全民军首领邱须乎身体文弱，于战斗中却能身先士卒，英勇无畏，置生死于不顾。后来，邱不幸被俘，傅亲审，邱不为淫威所伏，不为利诱所动，公堂之上，正气凛然，诉清廷诸端：违~~悖~~民意、丧权辱国的行径；斥清军屠戮民众的种种罪恶。傅怒极，即令刽子手杀邱须乎于泸定。事后，天全同志辗转扶灵回县，县人均受感动，肃然起敬。由是，邱须乎舍身抗清保路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传诸口碑。

大约就在邱须乎率部控扼天全城以西至泸定的通道，并赴炉战斗这一段时间，天全同志军的其他会众，在天全同志军另一首领杨复荣（始阳人）的率领下，应罗子舟（雅属同志军首领）的邀集，赴雅集结，驻雅安城西郊，参与围城，攻城。从9月14日同志军围城起到10月30日撤离时，杨率部始终克尽职守，同兄弟县的同志军紧密配合，不断给清军以重创。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民军计划猛攻雅安城，为知县存禄事前侦查，令清军纵火焚烧东门、南门外民房，并出西门攻击同志军。此时，驻扎西门外的杨复荣部一个个头顶铁锅、铜盆，冒死向前，率先向清军反击。据传，杨复荣还带人制作树炮，以供民军攻城用。战斗进行很激烈，同志军伤亡约二千，并有两门树炮被清军劫获。被俘的同志军将士亦遭杀害。据雅州教会英人赫威阿彭绍记载其所目击情状，当日“在中学军营前发现十八个人被砍了头，县衙门前杀了八个，道台衙门前杀了二十个”（《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一场恶战，同志军尽管伤亡严重，未破城，但士气不灭，仍围城而不散。直至10月29日荥经战役民军失利，大关失守（因原降清军叛变，暗为内应），关外清军蜂拥而入，保路民军撤离雅安方罢。杨复荣率部撤离后，转战各地，直至次年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并遣散同志军成立义勇队，才解甲归里。尔后，杨视时事日非，便只身“高蹈”，受匾三道“功成身退”、“明哲保身”、“揽辔澄清”（惜已失），栖身道门，上始阳丹风山作道士寻清静去了。

以上所述，仅天全同志军在辛亥秋保路运动中的一段史料。事实上，历史的壮举是可歌可泣，为后世树立了景仰的楷模。比如郑孔斋（天全城厢人），年纪尚轻，随同志军转战乐山，备受艰辛。返家奔丧三、两日即离家复行，道中（约在夹江一带）被俘，亦慷慨就义。其他正如一些老人所慨叹的那样：“不能忘了，雅安西行台万人坑里同志会的骨血，也有不少是天全的啊！”

天全茶叶史初探之一

退休教师 杨仁飞

天全是四川产茶地之一，特别是所产边茶深受康藏人民的欢迎。一九八三年四川省茶叶基地县工作会议在天全召开，把天全定为全省十二个边茶县之一，茶叶产量更加猛增，一九八四年已突破万担。其中，边茶产量为九千七百多担，细茶为七百担，加工成品茶包一十七万五千九百多包（每包20市斤）。这确是天全发展边茶的一大优势。

天全茶叶究竟始于何时，种于何地，史料上记载不多，现在就我了解到边茶的史料提供一点情况供研究边茶史者探讨。经初步考证，约在公元六百二十六年到六百四十一年之间，（即唐贞观初年）“天全东西河流为龙尾峡所束，水道迫仄，猪（与瀘通）为大泽，向有大小海子之称”，当时有一位被封为英烈侯的孟将军，根据山川形势的特点，把龙尾凿开，让河水顺流畅通，将天全的水患平息下来，人民始能安居乐业，从事生产。接着他“于蒙山采茶于山谷间遍种之”，并且他又“教其民以树艺采焙之法”，“时方行茶马之政，民用利焉”。（以上据天全州志英烈侯碑记，英烈侯记）又据《四川通志》记载：西汉宣武年间，蜀人王褒《僮约》中记有“武阳买茶，杨氏担荷”，“往来聚市”，这说明商品化的茶叶已在武阳（今彭山县双江口）这个场镇上出现了，公元六四一年（贞观十一年）文成公主下嫁给藏王松赞干布，带去了大批茶叶、手工艺品，耕作用具等。《西藏政教鉴附录》记有“茶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土也。”《新唐书》《隐逸传》说“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当时有所谓“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这里的蕃市也指藏族参与的市场），以上充分说明茶叶市场从西汉到唐朝四川就已出现了，而茶马交易在唐朝也已正式形成。既然孟将军于蒙山（四川蒙山）引茶种到天全，又能教以树艺采焙之法，当然应该说孟将军对茶叶是有所研究的，既懂得栽培采制技术，又看到了茶叶在当时经济市场上的地位，所以《州志》《英烈侯记》，“时方行茶马之政，民用利焉”语，正说明天全茶叶在唐朝时已进入了市场，商人是获得了实际利益的，至于在哪一年，在哪一个市场尚待考证。

按当时种茶比较集中的地方，据《州志》载，是在凤头村，即今芦山县宝盛乡玉玺河公义场一带，此处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人口聚居，清雍正改土归流以前，是从成都经邛崃越正溪山到天全的入境口（古道），在这里先种多种是理所当然的。而天全城则因水患初平，条件稍迟，理当稍后。其时种植形式多为自愿认种，并无分配或安排，树成后，于每年三月初后采摘，一年出息最多，如《州志》有竹枝词描绘：“采茶刚趁月光明，大妇相随小妇行，采到春心尖纯处，春愁一缕发幽情”。这就可以想见当时的风韻了。多年来天全是处在政令鞭长莫及之地，即使是后蜀王孟知祥氏统治四川（公元九三四年到九三五年）大刮民膏民脂，推行“榷茶之法”的情况下，天全仍属土著民族而自理生涯。

公元九六六年即宋乾德五年，宋太祖平蜀以后，曾下令“放罢一切横敛，茶遂无禁，民

同便之”，用以缓和社会矛盾。但为了控制边民，以巩固其宋王朝统治，将天全高杨二土司辖民“编为土军三千，茶户（或谓花园户）八百”种植茶树，采焙制造，以备赏给边民”，这样，天全茶就进入有组织而又多少带点强制性的种植了。宋朝为了加强他的“贮边易马”的茶叶政策，到了德佑年间，天全就开始设置“土驿丞，土茶官”，专门管理茶叶事宜，当时虽无“引张”，“课税”，但却规定有一定的贡额，要交实物——茶，同时开茶马之政，以茶易马。那时茶少，番人很珍贵，仅用四十斤茶即可换取番人一匹好马。慢慢地有些商人看到以茶易马有利可图，遂把私茶混杂进去。茶叶一多，马价就抬高，州府派人设关卡查禁，商人就绕道过关，或私塞包袱过关，甚至发展到每斤茶塞私税银二钱，或金五分，这就为以后茶叶征收课税提供了依据，进而商人们又制造假茶，以假充真，真假混杂，州府虽亦派官巡禁，但结果越禁越凶。到明朝时沿用“贮边易马”的茶叶政策，公元一三六八年（明洪武五年），户部明确规定“四川碉门（天全）黎雅茶，宜十取其一，以易番马”。并设茶马司于“秦（今天水市）、兆（今临潭县）河（今临夏县）雅（今雅安市）诸州，听其西番纳马易茶”（明史1947页）。按“茶马司”系朝廷主管茶马交易之“内府”派出机关，当时朝廷还给各少数民族颁有皇帝圣旨，“合当差拨，不信者斩”的金牌信符，凡以马换茶时必须拿这个金牌到该司去与之勘合（明史1968页），天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由茶课引定税额设茶马司的。由于茶禁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所以弊端丛生，私茶渐多，直到明洪武中期，易上等马一匹，即需茶叶八十斤，以后远来商人增多，马价茶数亦多，甚至发展到天全“茶马司”用八万多斤茶才能给番人换七十四匹马，而且还多是瘦弱的，平均约需一千四百多斤茶才能换一匹马。其后虽也再增设“茶马司”，其结果也不能弥补其弊端。

我县猕猴桃资源调查

杨志全

猕猴桃俗称“毛梨”，是一种雌雄异株的藤本植物，它不仅形态优美，可作美化环境的范木，其果营养丰富，还对多种疾病有捕疗功能。国外从我国引种栽培，有的已形成商业性种植，经济效益显著，是国际上新兴水果之一，前景十分广阔。我县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很适合猕猴桃生长，野生资源又颇为丰富，但要合理开发进行人工选优驯化，开展商品性的种植和加工利用，还必须对野生猕猴桃资源进行调查研究。一九八一年在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科委、农业、林业等部门密切配合，按照国家统一的调查提纲，科学的规范要求，抽出干部和工人十二人进行技术培训，从八至九月历时二十八天，对我县两路、紫石、青石、小河、大河、思经、鱼泉、老场、和源、乐英、新场、前阳、兴业、钢厂等十四个乡镇及所在的国有林和伐木场的野生猕猴桃资源进行普查，爬山涉水，足迹所至，海拔低的为七百米，高的为二千六百米。共采集标本一百六十个，每个标本包括枝、叶和果实俱齐。这次调查，按期按质取得了第一手的科学资料，经上报后，科委发给了科技奖状，有以下三条经验可资借鉴：

一、基本查清了资源底细

普查的十四个乡镇，产猕猴桃的村有四十四个，组（即生产队）有一百三十八个，分布面积一十四万零六百一十七亩，有猕猴桃一十四万二千二百九十四株（按实地勘查定点推算），其中有八个乡发现猕猴桃带（产量八千斤以上），全县猕猴桃产量（按平产年份计算，产量零星未作调查的乡未包括在内），经定点推算为六十七万八千九百四十五斤，产量较集中的有两路、紫石、青石、小河、大河、鱼泉、老场等七个乡。

二、初步掌握了猕猴桃资源的品种和分布

普查表明，全县猕猴桃品种，以中华猕猴桃为主，此外，不具备实用性但可作为砧木嫁接培育优株的光果型猕猴桃，在钢厂、老场、思经、鱼泉、大河、小河、青石、紫石、两路等乡分布也很普遍。依据植株外形和果形初定鉴定，计有对萼、狗枣、革叶、显脉、葛枣、紫果、天全等品种。

通过调查，被发现的优株类型有：1.大果型，老场、大河、和源都发现单果重七十克以上的，其中大的单果重为八十三点五克；2.兴业公社罗李大队的早熟株，八月中旬现场采摘果实，发现其籽粒已变黑成熟；3.钢厂乡发现有多果单株（疑是多花猕猴桃）；4.思经乡高山寺发现矮株，主蔓长仅三米；无空枝；5.普查到了全省在天全才有的独特品种，暂取名“天全猕猴桃”。

三、考察了株猕猴桃的生长环境

调查证实，我县猕猴桃在海拔八百米以上到一千六百米地段分布最多，产量最高，一千六百米以上，则分布零星，长势也弱。猕猴桃喜在温暖的气候下生长，对土地的要求是肥

沃、酸性到中性，多湿但不胀水，在我县宜林的深丘和山区大部份都具备这些条件。在其营养生长阶段，要求较荫蔽的环境，结果株则需阳光充足，一般在沟槽地带的植株，顶部结果情况良好，基部很差。结果株一定要有树木或其他植物作为依附使能攀援，否则便不结果。

这次调查所取得的上述成果，为今后有志于保护、开发利用这些资源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者，不无依据和参考之价值，在此志其概况，有关数据和标本特征不再一一介绍。

与此相关的，我县从一九八〇年至八三年，县科委和农科所采用直播、扦插、嫁接、野生苗移栽等方式人工栽培猕猴桃成功，在雌雄花期授粉不良的情况下，农科所于八三年八四年曾两次采用人工授粉方法也获得了成功，结出了果子，限于主客观条件，仅作了小面积小规模的试验。这些经验是科技人员潜心工作所取得的，值得在此附记。

天全县西医药进入经过

彭 苏 苍

天全地处边陲，加以道路崎岖，交通梗阻，人们保守观念浓厚，对于新生事物，大都不易立即接受，因而一开始对西药治病价值是认识不足的。

辛亥革命后，只有经营洋广杂货的商人，去雅安、成都买货时带回惊风丸、化风丹、十滴水、仁丹……等中成药在铺上销售。直至三十年代，始有李如芳、方家老妇（是雅安爱华药房吴姓亲戚）开始经售西药成品药，为金鸡纳（奎宁）丸、头痛粉、苏打片、疳疾糖（山道年片）及杂货铺所售中成药，不到20种药物。不久李如芳停业。1934年有始阳人胡开壁，在当时西门开设药店，在上述药品之外，又添售万金油、八卦丹、疟疾丸、复方阿斯比林片、金灵丹等药，但也不到30种药物。

而上述售药者，只能照仿单内容向病人推荐解说，毫无医疗技术，故当时患病群众得到西药治疗效果甚微。

1936年夏，我回天全后，开始行医，出售西药：原质、片剂、针药、成品达一百种以上，在天全第一次使用西药治疗病人，由于西药针剂见效迅速，故我业务蒸蒸日上。

1937年徐伯衡也以惠康药房名称出售西药，同时开业行医。（徐是成都四川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因此，服用西药者甚众。

1938年有邛崃向祥生来天全开业行医，此人中西药都用，但江湖医生习气浓厚，在一次注射针药中出了医疗事故，即离天全，前后不到一年。

在四十年代时，有始阳曾大成（部队军医）在该地开业行医，使用西医治病，到解放时止。

在此后有新场韩潮如（曾任部队军医处长）回家行医，但由于他家大业大，操袍哥，当大爷，故有力贩大烟、枪弹，不屑行医，不到一年便去做大买卖去了。

1948年本县人马志聪（部队军医）在正西街开设一个“志聪诊所”，行医兼售少数西药，解放后，被吸收到县人民医院工作。

天全县国大代表选举经过

杨 国 治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基于国际、国内舆论压力，不得不打出“实行宪政，还政于民”的旗号，为一党专政个人独裁遮羞，纠集青年党和民社党等附庸，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在南京召开伪“制宪国民大会”上，通过以《五五宪草》为基础的所谓《中华民国宪法》，并于一九四七年元旦公布施行。

按照“宪法”规定，总统应由“行宪国民大会”选举产生。国民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出，以县、市（省辖市）为单位，一百万人口以内的县、市选举一名。人口在一千万以上的县、市增加一名。特别市和职工团体、边疆民族等视其选民之多寡而定名额。并订于一九四七年十月选举。

当时的天全人口不到10万，只能选举代表一名，参加竞选的有县参议会议长、青年党成员黄璞（号卓生），地方势力代表人物高平阶，“蒙宾合”袍哥头目高鉴明，灵关乡封建把头、成都“康灵公司”董事长余国文等。

当时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认为西康的国大代表中应有学者、名流点缀，体现所谓“民主政治的选贤任能”，更主要的是天全情况复杂，地方势力常因私怨而械斗、仇杀，闹得县无宁日。再加上这次国大代表的竞选角逐，势必引起地方纷扰，不利于他的统治。刘遂邀请寓居成都多年，从未插手天全事务之杨声回籍竞选。

杨声字懋实，早年离开天全，长期在成都和重庆等地从事教育工作，曾在重庆大学与著名学者马寅初等共事。当时马任商学院院长，杨任工学院教授，在四川的教育界、学术界颇有名望，天全县人对他亦有良好印象。但因杨离乡多年，县人多慕其名而鲜见之。杨国治遂以家族关系于一九四七年夏陪同杨声回天全向各方疏通，并暗示黄璞、高平阶、高鉴明等：杨先生是刘主席请回来竞选国大代表的，有刘主席的支持。为了避免纷争，以地方安宁为重，最好自动退让。

几经劝说，终于使黄璞等愿退居后补，县上各界人士亦认为杨代表天全县出席“第一届行宪国民大会”为适当，表示一致赞同。但根据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的分赃协议，凡青、民两党提名的地区，国民党不得另提候选人，纵或以五百人以上选民签署提名而当选之候选人，无论得票多少，选民是否同意、以及当选与否，都应成为“国大代表”的协议。而黄璞为青年党提名之候选人，本人虽愿退让，青年党却不肯放弃这一名额。为解决矛盾，刘文辉征得青年党和黄璞同意，以荣经县长作为交换条件。杨声遂以压倒多数的选票而顺利当选。一九四八年四月初在“国民大会”中又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从此天全县避免了一场争当代表的灾难。

忆解放前夕我响应起义的一些情况

李家甫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即忙于发动内战。当时的国民党政权既拥有优势兵力，又有美国在背后大力支持，因而一些人对蒋家王朝还抱有不同程度的希望和幻想。我也并不例外。当时，我任天全县政府民政科长。到了一九四八年，蒋介石的剿共军事在前线节节失利，屡战屡败；在后方“法币”贬值，物价猛涨，奸商乘机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市面已是米珠薪桂，人心惶惶。加之当时雅安地区大种鸦片，天全更是主要产地，以枪支弹药相交换，舵把子林立各地，占山为王，打冤家，私仇械斗不断升级。“烟枪袍”三位一体，搞得整个县乌烟瘴气。当时的天全县政府根本无力过问，只好装聋装瞎，听之任之。真是民怨沸腾，怨声载道。

一九四九年解放军大军渡江，国民党政权已岌岌可危，崩溃在即。这时，我们对整个时局由产生怀疑而完全失去信心，自身不得不为身家妻儿安全作打算。虽明知国民党必败，却未料到崩溃有这样迅速；虽明知共产党必胜，但对中共的政策根本就不了解。假设共产党的政策不好，为何解放军的进展又这样的神速，足见其政策拯人民于水火，为人民所拥护。我又曾听说在上海就有苏联革命后逃出的白俄，因无生产技术，男的擦皮鞋，女的卖淫。想走吗？遍地烽火，到哪里去。有大量黄金带走维持生活吗？没有。蒋家王朝曾给我隆恩厚遇吗？没有。投奔解放阵营吗？红军流血流汗打天下，现在想摇身一变投机吗？没有那样的好事。疑惧重重如坐针毡。这时，县里所谓稍有思考的如李家楷、高上伍、徐剑侯、王沛生、邱芝山、李家甫（辅）等十人不约而同组成一个“簸箕会”，每周星期日在各家聚会，表面是聚餐，实际是交换对时局的发展看法与见解，企图能得一点安身立命之道。这样聚会一直延续到八九月份。同时我与家兄李家楷、与徐剑侯等多次专程赴雅，长住同乡杨国治家以便分头打听政治行情，或拜谒当时雅安所谓的权要人士黄以仁，郑少成、陈仲光、王靖宇等，希图在他们当中，或可得到处世诀窍，奈何，这些人的立场观点各不相同，见解自然各异，终不得一个正确要领，快快而回天全，不下四五次。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十日重庆决放。形势一天几变，蒋家王朝的残兵败将涌向成都一带，我县原在外面工作的，读大学的，还有在反动透顶游干班受了训的学员，五花八门纷纷回县，搞各种不同的活动。有的人甚至向我掠索活动费，开口动辄就是大洋几百元，真伪难辨，穷于应付。这样的境况究竟怎样才是善策？日夜焦灼，度日如年。我只有抱定以“不变应万变”的信念，八方不贴边，或者，可望求得苟全。

十二月九日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在四川彭县宣布正式起义，西康省政府同时宣布起义，天全县政府奉电令后赓即宣布起义，这时在我的心情上行动上才算有一个正确的切实的目标，庆幸险恶困境得以解脱。紧接着我们接到上级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布告和三大纪律八